2018年终盘点之文学篇

小说佳作频出，打开现实主义写作多重维度

■本报记者 钱好

2018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坛的小说“大年”，更进一步说，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丰收年”。

在今年刊发于国内文学杂志的小说作品中，王安忆、张炜、李洱、迟子建、周大新等一批知名作家都有长篇或中篇新作面世，其中不乏睽违文坛多年、十数年磨一剑的回归之作。多数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聚焦现实题材，但又各自展现出不同的维度。深入历史，或是直面当下，深耕一方土地，或是体察一种人群，工笔或写意，这些作品体现了当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以往同一类型写作的创新和突破。

深耕一方土地，用不断深入的地域书写描绘斑斓文学地图

许多作家持续多年用文字深耕自己最熟悉的一方土地，扎根于同一片疆域，以不断丰满的风物与人物，构成一张日渐斑斓的、有生命力的地图。今年，几位作家均展现了这样的新作，为各自的“地域写作”谱系带来了新的丰富与拓展。

王安忆捧出的长篇小说《考工记》，被称为“《长恨歌》姐弟篇”的又一部上海别传。从上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小说借由主人公陈书玉与陈家老宅“一人一屋”的浮沉，串起了上海半个世纪来历史变迁的轨迹，和在这个大时代中无数小人物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小说主人公从一位世家小开，逐渐蜕变为一位普通的退休小学教师，与《长恨歌》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仿佛是互文关系，以另一种性别和视角，展示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精描细绘这座城市的精神。评论家毛尖这样写道：“王安忆完成了她对20世纪的更复杂建构，她既推进了30年来的上海书写，也用文学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的最高议题。”

迟子建的中篇《候鸟的勇敢》，则是她在多年躬耕其中的东北文学版图上的又一次跋涉。小说不仅诗意地展开了一幅白山黑水的自然画卷，同时“候鸟”也构成最核心的隐喻，那些在冬天南下，夏天又回到东北的“候鸟人”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典型的群体，牵出的是东北近年浮现的社会症候。作家阿来评价这部小说如同结构丰富的交响，故事、自然、人、社会，一层一层逐次呈现。迟子建说，这部新作是她在《群山之巅》之后，再一次回到同样的一片故土：“我依然情钟于这片土地，依然能在这片土地里面发现当下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焦虑、矛盾、不公、欢笑、坚忍、眼泪等等。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侯波的中篇《胡不归》，如同展开了一幅陕西农村的风俗画，鲜明活泼的生活细节跃然纸上。小说主人公薛老师忙前忙后地处理村里文艺演出跳广场舞的纠纷，别家树叶落到自家院子的“公案”，承包种地的争执……文中书写的，几乎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用侯波的话说，正是很多别人不关注、记不住的细节，却是作家写作的真正来源。

凝视苍茫岁月，以全新的切入角度和方式展现历史别样剖面

“以史入文”，是许多当代作家钟情的写作方式。但有意思的是，今年的几部小说用不同于往常的切入角度和方式，展现出了历史的别样剖面。

李洱的《应物兄》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十多年前，李洱在家门口贴上“写长篇，迎奥运”的纸条，写的就是《应物兄》。如今，这部打磨13年的作品终于亮相，其中灌注了作者对于历史和知识分子多年的思考。小说围绕着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展现当代文人学者的日常生活，串起了当代文人群体30多年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李洱如艾柯般在中西方文史哲经典著作中自如穿梭，在一种戏仿经史子集的灵巧叙事中，对历史不断地融入和化出。评论家黄德海说，《应物兄》是一部根基于历史的未来主义现实小说，是一部建立在虚构基础上致力于人世的厚重之作。

散文家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捎话》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刘亮程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一人一驴，背负着“捎话”的任务，穿越战场，见证了许多生死和不可思议之事。在一种近乎架空的时代背景中，虚与实，战争与历史，如羊皮卷一般展开于他旖旎瑰丽的笔端。写作时，刘亮程曾参考了一部成书于11世纪的古老大辞典，他说：“我从那些没写成句子的词语中，感知到那个时代的温度。每个词都在说话，她们不是镶嵌在句子里，而是单独在表达，一个个词摆脱句子，一部辞书超越时间，成为我能够看懂那个时代的唯一文字。”

军旅题材的小说在今年也收获颇丰，其中不少都有着开阔的历史视角。不久前发表的长篇小说《牵风记》，是军旅作家徐怀中的新作。小说聚焦“挺进大别山”那段特殊的历史，塑造的几位军人形象都来自于作者本人的亲历，以浪漫明丽的笔触，描摹出战争岁月的血与火之中，人性的光辉与美好。陶纯发表于《十月》的《我的两个战友》，则围绕三位战友近30年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拓宽了反腐小说的疆域。

对焦社会一角，关注特殊人群，以爱探触生活深处的困境和暖意

今年的小说创作中，社会话题依然是最热门的题材之一。这些作品或关注当下社会问题，或聚焦特殊人群，敏锐独到地探触至生活的深处，给出作家的独到思考。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以直击现实的勇气和切身的独特体验，聚焦社会老龄化问题。小说以“拟纪实”的方式，用万寿公园的黄昏纳凉活动安排结构全书，写出了每个人进入老年都可能经历的精神过程：从抗争、无奈、妥协，及至失败、投降。书名正是作者对于衰老的一个精妙比喻：变老并不是悲惨的事，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在这过程中，老人行走于暮色中的沿途风景，也都一一收入书中。周大新在创作谈中这样写道：“天黑之前，人生最后一段路途的光线会逐渐变暗且越来越暗，自然增加了难走的程度。这就需要一束束光照亮。”正是这爱与美形成的光亮，赋予了小说聚焦现实而又能超越现实的温暖与力量。

张炜的长篇《艾约堡秘史》，对焦的则是当下的“巨富”人群。小说通过一个私营企业巨头吞并风光旖旎的海滨沙岸的典型现代事件，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膨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而通过主人公淳于宝册的成长经历，小说抛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那就是一个人在拥有了财富以后，如何应对精神、内在的变化。评论家李敬泽评价说，这部作品集中了这个时代的很多精神困境，财富、欲望、良心，这些价值冲突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去面对。

张翎的中篇小说《胭脂》用一幅画作勾连起从民国至当代三代女人的爱情，与在大时代裹胁中女性的顽强命运。与李碧华的《胭脂扣》两相对照，《胭脂》不再是一个痴情女子薄情郎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人是理智的、强悍的现代女性形象。而在细腻的勾勒中，时时闪现的是作者对世情，对人性的洞彻和颖悟。用张翎自己的话说，她笔下的主人公胭脂，不是“戏子交际花脸颊上的那层红粉”，而“是颜色，是温度，也是品质。”

部分文学刊物主编推荐的小说篇目

本报特别邀请了《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和《花城》的杂志主编，共同推荐了十部今年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下面是这十部小说及其推荐理由。

《人民文学》2018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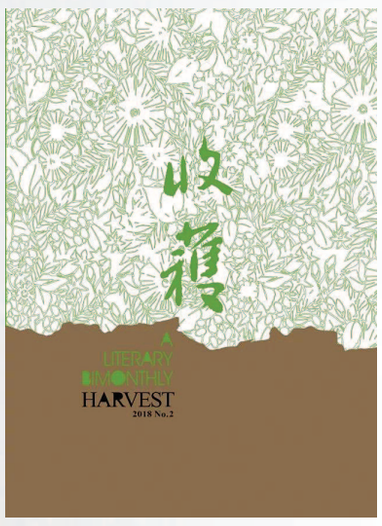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副主编 徐则臣

长篇小说 周大新《天黑得很慢》 《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

倾心于老龄难题和老境体察，让我们从中体会人生终点前的种种情状。时尚诱引和旧事纠缠、进城落脚的心事与城市落户的心机、老年临终的模糊心神和陪护报恩的清晰心志……在小说中渐渐汇聚为情和义，在平常人不平静的心中无限重叠，温度、道德、筋骨都活化在小说里，社会治理的问题渗透到了褶皱深处，人文关怀的广角使得以前并未足够凝视过的老年护理人群有了被表达的机缘。

长篇小说 徐怀中《牵风记》 《人民文学》2018年第12期

这是一部具有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小说。战争时期军队生活的文化色彩、美好念想和复杂考验，在艰苦的岁月之上泛出明丽的光泽，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留下惋惜与痛悔，在自然的山河之间现出美好人性的温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



《收获》2018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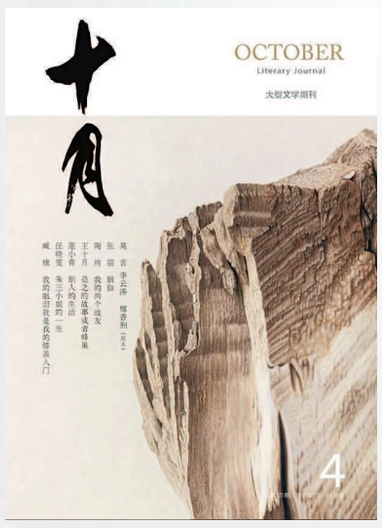
■《收获》主编 程永新

长篇小说 李洱《应物兄》 《收获》2018年长篇专号(秋卷)

十三年潜心写作，酝酿出这样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之作。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这个也真诚也虚伪的人物，串连起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为我们置身的生活画下了一帧帧生动的写真，并最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

中篇小说 迟子建《候鸟的勇敢》 《收获》2018年第2期

金瓮河自然保护区的张黑脸曾在一次扑灭山火的战斗中与队友失散，遭遇猛虎，他被吓昏过去，幸亏有一只神奇的白鹳使他躲过一劫，自此，他变傻了，心却与候鸟特别亲近……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触及了东北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这些人、情、心融汇到东北莽林荒野中，汇聚成迟子建的文字力量——“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拂照，脊背不会特别凉。”



《十月》2018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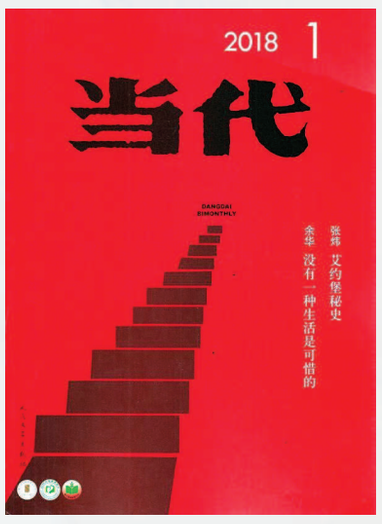
■《十月》主编 陈东捷

中篇小说 张翎《胭脂》 《十月》2018年第4期

从清朝宫廷里流出的原作，被洋人拍照，是第一重复制，再由青年画家临摹，已是复制品的复制品。然而，这一复制品的复制品，却被收藏家海外“土豪”奉为真品，只因“请人做过元素测定，是清朝的绢”。绢是真，画却为假。于是，《胭脂》仿佛构成了对当代人之古典情结的一次讽刺：古典不再是一种品质、一种风韵，只是郎世宁画作上的某个符号化的特殊标记，或者是科学手段探测出来的某个数值。

中篇小说 陶纯《我的两个战友》 《十月》2018年第4期

作品塑造了张无私、刘和平等当代文学画廊鲜见的人物形象。才能和背景均平凡的张无私靠对着人情社会运行规则的钻研和熟稔，一步步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晋升之途。自恃才高的笔杆子刘和平，在提拔副军职屡次受阻后，人生第一次送礼却撞在军队反腐的枪口上。



《当代》2018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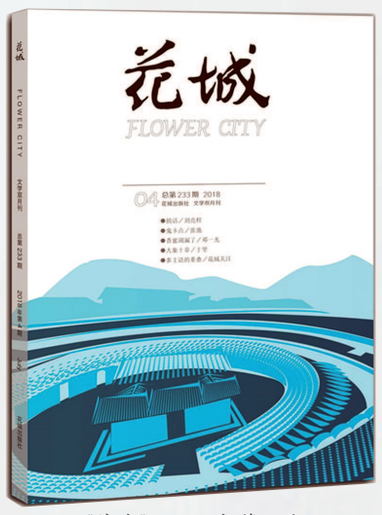
■《当代》主编 孔令燕

长篇小说 张炜《艾约堡秘史》 《当代》2018年第1期

这是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现实主义力作。从一座海边的艾约堡开始，小说回溯和现实刻录了堡主淳于宝册的命运。通过主人公所在的私营财团对渔村的改变，聚焦了经济与生态、发展与保护、文化与民生之类的现实问题。小说对情与爱的探索揭示了当今社会对爱与美的向往和努力。

中篇小说 侯波《胡不归》 《当代》2018年第5期

作者延续了《春季里那个百花香》的切入方式，由人的精神需求入手，虽然探索的仍然是农村的精神面貌与走向，但显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侯波对农村生活极为熟悉，娓娓道来，有诗意有烟火。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侯波实际上是在探索今日农村人心走向的出路，让我们看到乡贤在一个地域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那作用带着弹性，伸入到了直线方块到不了的地方，使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花城》2018年第4期

■《花城》主编 朱燕玲

长篇小说 刘亮程《捎话》 《花城》2018年第4期

《捎话》的小说结构独特，因为人、驴、鬼视角的多角度叙述，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瑰丽色彩，整体叙述冷静却又深藏悲悯，对战争和人类信仰进行了反思，传达了反战、和平共生的意义。作者刘亮程是自然文学大师、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擅长以情绪入文字，将听觉感官化为视觉物象，在虚与实的艺术交错中审视人类的精神之战和物质之争，显示其历史大视角之下的悲怀之心和生命感悟。

长篇小说 王安忆《考工记》 《花城》2018年第5期

出身世家的陈书玉，在时代大潮的反复冲击下，与老宅共同经受数次的修缮和改造，终致人屋一体，互为写照。人物沉浮与老建筑的存亡紧密相连，时代的起落更迭促使陈书玉个人的成长与嬗变，演绎一段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八小时写完一部乐曲，三天后登台演出

跨学科现场写作 让音乐更加天马行空

■本报记者 吴钰

八小时内现场谱写一部打击乐与钢琴二重奏作品，三天后在音乐会上演出，小作曲家能否胜任？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专科学校主办的第三届音中奖全国作曲比赛作品，获得了业内极高评价。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郭文景教授表示，现场作曲时间有限、比赛中的打击乐器通过现场抽签选取；选手仍完成了结构、层次、情绪各方面都较为完整饱满的作品，显示出了对乐器音色特征等相关知识的了解和优秀的作曲功底。

评委会主席上海音乐学院徐孟东教授介绍，除了预先准备的参赛作品，设置现场写作环节属于国内首创。其能够尽量排除专业老师的指导影响，更真实地反映选手的水平。“现场八小时写就的作品中，最长的有六七分钟，相当于一部完整的音乐小品。连夜打谱后交由上海音乐学院现代器乐与打击乐系的小演奏家，由他们三天内完成对作品的理解和诠释。小作曲家和小演奏家在三天中只有两小时的沟通，就迎来演出。这样的设置‘任性’而残酷地考验了作曲教学的积淀，也考验音乐教育中跨学科的交流与磨合。”上音附中作曲学科主任强巍昊教授介绍。

“打击乐的形式和音色非常丰富，但在中国发展较晚。直到近20年，传统打击乐才进入专业音乐学科课程体系。中国作曲家的打击乐作品也比较少。”强巍昊表示。在前两届音中奖比赛分别以弦乐和民乐为主题后，本届特别选取打击乐为主题，旨在开发小作曲家对音乐的理解，开拓中国音乐界的未来视野。“音乐的核心体系是节奏，孩子们有了对音高的把控，还要靠节奏的组织将音乐完美呈现。”

选手的年龄不过十七八岁，作曲技术上还有不足之处，却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不少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原创作品中，尝试中国民族打击乐与西洋打击乐的交叉融合的《多面体》、使用空灵鼓独特音色表现《楚辞·九歌》古老传说的《山鬼》等；大胆的配器组合和情绪变化幅度，让赵曦、刘晖、郭萌黎、唐建平、高为杰、郭文景等受邀担任评委的国内一流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赞不绝口。

“此次以打击乐器作为主体，要求参赛选手对打击乐器需要更多研究，因为相比传统音高乐器，打击乐器大大拓宽了，这也提升了打击乐在创作教学中的地位，特别是要求师生对非常规打击乐器有着一定的了解，从而达到通过赛事促进教学的作用。”徐孟东说。作曲家高为杰点评获奖作品形式多样，一等奖作品尤其以十二音技术将打击乐音高乐器和无音高乐器的音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进入决赛的十部作品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上海音乐学院杨茹文教授表示，比赛推动了优秀打击乐作品创作的诞生，希望未来能以比赛促进教学，吸引中国作曲家未来更关注打击乐作品。

17年耗资2800万欧元 比萨斜塔扶直四厘米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世界文化遗产，位于意大利比萨城的比萨斜塔因为斜而不倒成为举世闻名的景点。近日，根据一项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58米高的斜塔在过去17年间被扶直了四厘米，专家预测，斜塔至少还可以屹立200年。

“这些年，塔越来越斜，令人感到担心，”监测小组总监罗贝托·切拉说道：“我们移走了斜塔倾斜反方向的土壤，斜塔得以被拉直。”斜塔如今稳定的状态得益于过去17年间的一项修复过程，据悉，整个工程共耗资28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2亿元）。

“没有什么比建筑的稳定性来得更重要，”比萨大学地质教授南齐安特表示：“斜塔目前的状况好于我们的预期。”

修建于1173年比萨斜塔由著名建筑师那诺·皮萨诺主持修建，是身前比萨大教堂的独立式钟楼。比萨斜塔建造初期塔高被设计为100米左右，但动工五六年后塔身就从三层开始倾斜，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完工。

比萨斜塔为什么倾斜？此前有挖掘表明，钟楼建造在了古代的海岸边缘，因此土质在建造时便已经沙化和下沉。此外，比萨斜塔下有多层不同材质的土层，由各种软质粉土的沉淀物和非黏土相间形成，而在深约一米的地方是地下水层。1990年1月，比萨斜塔建造800多年来首次因为倒塌危险对外关闭，当时建筑偏离垂直方向4.5厘米。

其实，除了“斜而不倒”之外，比萨斜塔的建筑设计也值得一提。作为最早采用圆形地基的建筑物之一，比萨斜塔的设计是圆形建筑的一大创新，在形成了独特的比萨风格的同时，也为后来拉文纳、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等地区的圆形建筑提供了范本。

在1717年出版《伽利略生平的历史故事》中还记载，出生在比萨城的物理学家伽利略正是在比萨斜塔上完成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他将两个重量不同的球体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结果两个铅球几乎同时落地，由此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不过，史学家们一直对这个传说的真伪持有不同意见。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比萨斜塔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编号第395号。

修建于1173年的比萨斜塔因斜而不倒成为举世闻名的景点。根据最新测算，斜塔至少还可以屹立200年。（资料照片）